

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諸多見微知著的細節。通過這些田野材料書寫成的撰述，讀者能夠玩味「天下第一村」村民的生活細節，從而對後集體主義實踐多一種直觀的體驗。

是村民在中國社會大背景下有了選擇的自由，只要村民不惜代價，就可以隨意選擇離開村莊。99.9%村民和村裏的幹部，沒有選擇走這條道路，他們在「生活好」和「民主自由」之間選擇了「生活好」。放棄自由而依附集體大同的心態，其實是中國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理結構。華西村人不過是這種中國文化的具體實踐者或持續保持者而已。（頁299）

引文中從「但是」開始的部分，顯然存在着邏輯跳躍。且不論華西普通村民是否有自主選擇的空間（至少在筆者看來，如果因為離開，就被剝奪一切，從而變得一無所有，恐怕不能算作有選擇的自由），即

以80年代以來華夏大地「去集體化」的浪潮而論，就足以說明農民自身的選擇到底是「自由」還是「集體大同」。否則，當年小崗村按血手印分田單幹的舉動，又作何解釋？同樣的代價下，如果集體大同帶不來「生活好」，人們自然就會選擇單幹；如果失去「民主自由」，能換來「生活好」，村民大體也還能忍受，此時他們會暫時懸置對前者的追求；如果「生活好」的同時，還能有「民主自由」，人們當然會歡欣鼓舞而不是拒斥後者。從全書論述中，我們得不出作者這樣的結論，即「放棄自由而依附集體大同的心態，其實是中國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理結構」。

與保守主義訣別的宣言書

● 孫傳釗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會田弘繼譯：《アメリカの終わり》（東京：講談社，2006）。

繼2006年2月19日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上發表題為〈新保守主義之後〉(“After Neo-conservatism”)一文，2006年2月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對布什 (George W. Bush) 政權和新保守主義進行批判和反思的新著《美國處在十字路口》(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在美國和歐洲同時出版（歐洲版的書名

為：After the Neocons)。該書被歐美讀者看成是福山「與保守主義訣別的宣言書」。與成書之前發表的上述文章相比，該書只是更詳細地敘述了他思想上的一些轉變，更明確地闡釋了一些以前沒有充分闡明的觀點，並可以歸結成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單憑民主是否能醫治恐怖主義；二，新保守主義者誤讀了斯特勞斯(Leo Strauss，又譯施特勞斯)的思想。作為一個曾經支持過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學者，福山的反思具有特別的意義和說服力，因此引起人們的關注。比歐美慢了將近一年，2006年底，在日本各大書店的書架上醒目地陳列了該書的日文版——《アメリカの終わり》(下引此書只註頁碼)。日本的學術界反應如何？從譯者會田弘繼(原共同社駐美記者)的後記和2007年1月8日《Aera》周刊所載的東京大學教授藤原歸一與福山的談話，至少可以知道部分日本讀者群的關心所在。

譯者會田考慮到一般日本讀者對新保守主義的源流不一定熟悉(與中國不同，還沒有出現德魯里[Shadia B. Drury]著，劉華等譯，劉擎校：《列奧·施特勞斯與美國右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的日譯本，斯特勞斯本身也沒有像在中國那樣成為學術熱點)，也考慮到知識界左翼傾向的日本讀者不少，因此在後記中，譯者引導讀者注目於福山敘述的新保守主義學者群體的演變史(該書第二章)，這一段歷史其實也就是部分美國知識份子群體戰後的分化歷史。福山之所以花了一章的篇幅敘述這一演變史學，實質就是在敘說自己的訣

別，事出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傳統右翼的源頭本來就有着區別。

今天被看作新保守主義陣營的許多主要成員，都是出自紐約市立大學(CUNY)的猶太血統左翼知識份子，上一世紀30年代，紐約市立大學托洛斯基主義者有相當勢力。由於受到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影響，就是在這個時期，許多人對斯大林主義失望後轉向保守主義。他們認為蘇聯體制是邪惡的根源。與傳統的右翼不同的是，最初他們追求過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模式，理想幻滅後，開始對「好心出發走向極端的危險」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體制反感和批判，但他們最初並不完全贊成資本主義模式。被稱為新保守主義之父的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在那時期還與托洛斯基有過交往。這個左翼群體在40年代逐漸向右轉向。

如果說40年代反斯大林主義是轉向的第一次「戰役」，那麼，60年代他們與當時新左派的反抗文化發生衝突就是第二次「戰役」——對肯尼迪(John F. Kennedy)、約翰遜(Lyndon Johnson)民主黨的「偉大的社會」的社會改良政策提出批判。克里斯托爾和貝爾(Daniel Bell)創辦的《公眾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成了這個群體討論國內政策的根據地。另一方面，克里斯托爾創辦的姐妹刊物《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卻成了他們議論外交政策的據點。到了70年代，這個反共產主義的左派群體在反對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潮流中，才別無選擇地與其他保守主義合流。其成員的政治傾向也進一

福山的《美國處在十字路口》一書歸結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單憑民主是否能醫治恐怖主義；二，新保守主義者誤讀了斯特勞斯的思想。作為一個曾經支持過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學者，福山的反思具有特別的意義和說服力。

福山不否認克里斯托爾和卡根等人的新保守主義政治觀念對布什外交政策和伊拉克戰爭的影響，但是，福山認為他們倆的新保守主義對里根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更直接、更大。

步分化。最近筆者重讀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6)，貝爾謂自己所持的「文化上保守主義、經濟上社會主義、政治上自由主義」的立場，正反映了該群體部分成員在那個時代的矛盾處境。

福山不否認1990年代後克里斯托爾和卡根 (Robert Kagan) 等人的新保守主義政治觀念對布什外交政策和伊拉克戰爭的影響，但是，福山認為他們倆的新保守主義對里根 (Ronald W. Reagan) 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更直接、更大。與布什相比，里根本人知性的文化修養和作為工會領袖的經歷，更加接近喜好讀書、思考、論爭和著書立說的這些猶太血統的原左派反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布什只是在他第二屆任期開始後才漸漸接近新保守主義思想的。

福山還和利拉 (Mark Lilla) 一樣，認為所謂把斯特勞斯政治學說也拉進去，硬說斯特勞斯的學說中隱含反民主主義的根本要素是一種無稽之談。福山的依據是：在布什政權裏邊參與推進伊拉克戰爭政策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屬於斯特勞斯學派的；倘若有人問前副總統切尼 (Richard B. Cheney) 和國防部長拉姆斯非爾德 (Donald H. Rumsfeld)，甚至問布什本人：「斯特勞斯是誰？」他們都會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之所以人們會有斯特勞斯政治思想對布什政權產生影響的錯覺，唯一的依據是因為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茲 (Paul Wolfowitz) 曾經短時期師從過斯特勞斯的弟子布魯姆 (Allan Bloom)。可是，沃爾福威茲本人從未承認過自己是布魯姆的弟子，他的外交觀主要是受到

沃爾斯坦特 (Albert Wohlstetter) 的影響，沃爾斯坦特確實影響過不少白宮官員。斯特勞斯自身及其學說，想要向學生傳達的，也只是希望他們認真思考西歐哲學傳統，而不是要他們去關注公共社會政策。如果要說，是誰把斯特勞斯的思想現實政治化，那就是所謂斯特勞斯學派的布魯姆和賈法 (Harry V. Jaffa)。前者強調美國政治體制繼承了傳統的自然法，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的繼承；後者則強調現代精神危機源自文化相對主義。

然而，福山不否認斯特勞斯學派與斯特勞斯本人的思想及布什的外交政策有一個連接點——都重視「體制」問題。但是，他在反省中強調，斯特勞斯雖然繼承了柏拉圖、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等人的傳統，強調體制對人的思想、意識、習俗形成的巨大功能，但是他的純哲學思維，和亞里士多德一樣，把人看成本質上是「政治人」，認為只有參與城邦的政治生活，人性才能在整體上健全。體制轉換能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這固然重要，可是，體制本身也包含了文化、宗教和習俗在內，所以轉換也是相當艱難的 (頁43-45)。布什政權內部分智囊人物對斯特勞斯思想的誤讀，最關鍵的原因是沒有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忽視了文化、宗教和習俗的力量，想依靠戰爭畢其功於一役來改變制度，使伊拉克戰爭長期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沼之中。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義的支持者低估了在像伊拉克這樣的國家推進民主的困難。福山的這一反省，值得目前中國內地許多迷信「體制轉換」的知識人深思。

《Aera》周刊所載的藤原歸一與福山的對談中，涉及最多的話題是東亞和平安全和日美同盟問題。日本是福山關心的地域，不僅因為他的外祖父和父母都長眠於京都，而且，這些問題才是日本國民最關心的，也是福山的著作日譯本暢銷的緣由。福山在該書的最後部分和對談中，都強調美國沒有能力迫使朝鮮放棄核技術，只能在防止核擴散和技術轉移上作努力。他提到美國新保守主義成員原先對東亞並不關心，只是90年代起才開始關注中國的崛起。「九一一事件」以後，布什修正了東亞外交政策，同時重視美日、美中之關係。福山在第二章談到斯特勞斯的追隨者應該從蘇聯、東歐的轉型中吸取教訓：體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90年代以來中國的

體制也有很大變化。他明確表示，中國是個相當開放的國家，反對形成美中兩極對抗格局，反對形成針對中國的日美同盟。

藤原歸一在《アメリカの終わり》的譯後記中提到了福山在2005年秋創辦了《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一份評論國際關係的新刊物，他不僅介紹了不少歐美一流學者為它寫稿，還特意提到中國學者王緝思，反映出日本學界對日中關係這個課題的重視。

2007年初，中國的各學術書店裏陳列着剛出版的、福山2004年的著作《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美國處在十字路口》的中文版問世可能也為期不遠了。

福山強調美國沒有能力迫使朝鮮放棄核技術，只能在防止核擴散和技術轉移上作努力。他提到美國新保守主義成員原先對東亞並不關心，只是90年代起才開始關注中國的崛起。「九一一事件」以後，布什修正了東亞外交政策，同時重視美日、美中之關係。

思想的醫療

● 王 悅



韓東育：《道學的病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人們今天較可以平心靜氣地分辨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就等於儒學，可這種平心靜氣在「五四」時代根本是不可能；我們也可以平心靜氣地指出「五四」人物的偏激，因為據說他們曾全盤否定了傳統，而這種傳統幾乎也就是以孔子為第一代表的儒學的代名詞。不過，「五四」人物的激進傾向其實從一開始就引發